

唐绍仪研究论文集

珠海市政协
暨南大学历史系 编

89年



19.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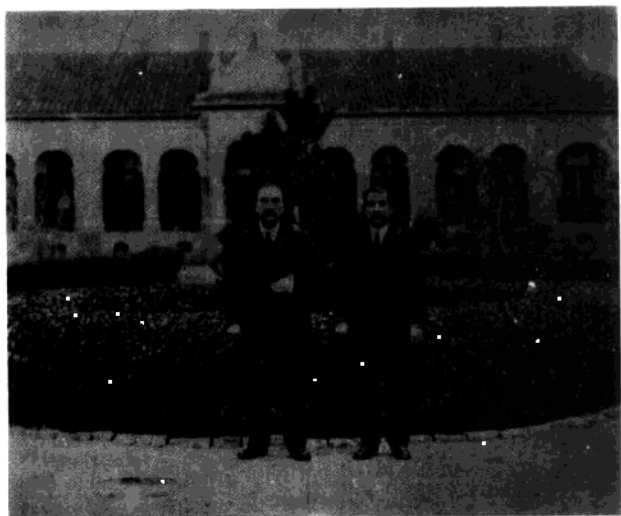
广东人民出版社



4474/39



唐绍仪



唐绍仪与孙中山



唐绍仪与部分阁僚合影

左起前排：教育总长蔡元培、工商次长王正廷、海军总长刘冠雄、暂署外交总长胡惟德、内阁总理唐绍仪；后排：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次长范沅濂、陆军总长段祺瑞、司法总长王宠惠、秘书长魏宸组。



目 录

略论唐绍仪的政治生涯·····	余炎光 (1)
关于唐绍仪的评价问题·····	焦静宜 (29)
清末外交新秀唐绍仪的崛起·····	苏 苑 (41)
1901到1904年的天津海关道——唐绍仪·····	姚洪卓 (59)
唐绍仪1908年的日美之行·····	李 晶 (70)
唐绍仪出使欧日八国考察财政述谈·····	李国荣 (87)
从《莫理循书信集》看有关唐绍仪的几个问题 ·····	程为坤 (98)
论辛亥南北议和与唐绍仪·····	丁贤俊 陈 铮 (119)
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	朱 英 (133)
试论唐绍仪内阁的组成·····	胡绳武 (149)
唐绍仪与袁世凯·····	骆宝善 (174)
孙中山与唐绍仪·····	陈正卿 (191)
试论唐绍仪与孙中山·····	夏琢琮 (221)
关于唐绍仪在民国时期的几个问题·····	郑则民 (237)
唐绍仪与民国前期党派·····	周孝中 (255)
乱世中的“调和立国”者 ——论护法运动时期的唐绍仪·····	莫世祥 (269)
唐绍仪与中山“模范县”·····	沈锦锋 唐仕进 (288)
抗战初期的形势与唐绍仪·····	张晓辉 (309)
唐绍仪死因及晚节问题再探·····	夏茂粹 (327)
附录：唐绍仪的家世资料·····	梁超润 唐仕进 (340)
后记·····	(349)

略论唐绍仪的政治生涯

余炎光

唐绍仪（1862—1938）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著名人物。他的起落沉浮，进取消极，经历过近代人物少有的迂回道路。要全面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不是三两篇文章就能定论的研究课题。这篇短文，仅就他在几个时期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提出一些粗浅的概括的看法。

一、维护民族利益的皇朝大吏

唐绍仪的政治生涯，是从担任清王朝的候选从九品小吏正式开始的^①。他一生中大半的政治活动，是在为封建皇朝服务中度过。经过近30年的努力奋斗，使他由一个品位低微的幕僚，逐渐递升至朝廷一品大臣。这决不是封建皇朝的恩赐，也不是唐绍仪个人特别走运所能给予，更不能说是依靠袁世凯锐意提拔的结果。

唐绍仪踏上政坛的日子，正是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

①《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032—2033页，台湾1973年版。

年代，而国力衰弱的大清帝国，面对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步步紧迫的侵略，对外交涉便成了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途径。唐绍仪开始从政，即进入这样的涉外部门，这不纯是一个偶然的机缘，更重要的是少年留学美国给他创造了具有从事涉外工作的良好条件。在朝鲜的16年，唐绍仪似乎是在寂寂无闻中虚度时光，但这段经历实际上已为唐绍仪积累了丰富的涉外工作经验，培养了坚实的爱祖国、爱民族的思想意识，又同袁世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都为唐绍仪后来的迅速成长奠定了牢固的根基。

1901年的《辛丑条约》，使清王朝进一步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因此，挽救国家危亡，维护民族权益，成了所有进步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改良派和革命派，分别以改革朝政或推翻清廷作为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在朝的各级官吏，对此也并不是无所作为，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也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在不同程度上为达到这个目标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几乎是与此同时，唐绍仪开始担负了独当一面的涉外工作——津海关道，历史为唐绍仪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和绝好的机缘。自这时开始到辛亥武昌起义时止的近10年中，无论在津海关道任上，或以后的西藏议约全权大臣、外务部侍郎、邮传部侍郎、奉天巡抚、赴美专使大臣、邮传部尚书等岗位上，他都能坚持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为维护民族权益作了出色的贡献。

列举唐绍仪从事的涉外工作并逐项加以评论，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务，纵观唐绍仪近十年中的涉外工作进程，明显的可以看到两个特点。

第一、在敌强我弱，朝廷又倾向于采取妥协和、屈膝媚外的外交政策的情况下，唐绍仪通过谈判，力保中外相安，但又不丧失国家权益或少损失国家权益。

1904年的中英西藏问题谈判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早在1903年英军侵入西藏以后，即胁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了“拉萨条约”^①。按照这个条约，英国实际上已将西藏置于其势力的保护之下。而列强则以英国取得西藏为由，纷纷意欲在中国获得同样的权益，其中俄国竟图将新疆、蒙古划入其势力范围。因此，保护我国在西藏的主权，抵制英国势力侵入西藏，避免列强的干涉和对我国领土的蚕食，成为当时对外交涉中的不易处理的难题。

面对严峻的现实，唐绍仪在印度同英使谈判中采取了清季外交史上罕见的强硬态度。他在会议上同英使费利夏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辩，唐绍仪严正表示：“此次来印度并非哀求议约，倘在印度不能妥商协议，我国自有办法，即本大臣奉命使英，亦自有办法。”^②唐绍仪在印度据理力争不达，宁愿中断谈判回国，亦不在没有明确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条约上签押。由于唐绍仪的坚定立场和卓越胆识，迫使英国同意将谈判移到北京继续举行。为了达成协议，唐绍仪又采取在条款中间接表示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地位的方法，使

① “拉萨条约”的内容，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347——348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② 程时敦：《清末民初外人侵我西藏史》。此处转引自李恩涵：《唐绍仪与晚清外交》，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第80页，1973年版。

英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最后，中英双方于1906年4月27日在北京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这个条约订明：“英国国家允不占西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①尽管条约规定西藏的电线、铁路、矿务等项利权有中英共享之意，但达到了保留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个主要的目的。这项对外交涉无疑是贯彻了尽量少损失权益的原则，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收回铁路主权方面，同样显示出唐绍仪的极力维护国家主权的这一特点。早在1900年唐绍仪任关内外铁路总办和1902年任津海关道时，他就通过谈判，顺利地收回了英国投资的关内外铁路（即现在京沈线），开始了我国收回外资铁路自办的新阶段。1906年，唐绍仪在沪宁、九广、沪杭甬三路交涉中，进一步扩大收回铁路主权这方面的成果。已经同英国签订合同的沪宁路，唐绍仪力争减少我国权益的损失，续借款由原来100万镑，减为65万镑，折扣亦由9折增至9.55折，行政管理机关则由华员2人、洋员3人的总管理处，改为设沪宁路局，由华总办一人主持，其他洋员均应秉承总办办理^②。还未正式签订合同的九广、沪杭甬路，唐绍仪则采取承认草约，并谋求在订定正式合同时扩大中国应有权益的做法。经过谈判，尽管未能满足绅商收回自办的要求，但九广路所签订的合同，实际上已确认主要职权由两广总督及总督委派之总办掌管。英人工程师及会计师只能起佐理作用，所

①前引王铁崖书，第345页。

②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篇》，第3080—3083页，1930年南京出版。

借款项由原定9折提高为9.4折，购料回佣改采一次支付若干酬金的方法^①。沪杭甬路则只借少量英款而由中国自行筑路^②。显而易见，这两路所订的合同，已使我国利权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二，在已订条约的束缚之下，或主权丧失已成事实下，唐绍仪则另辟途径，或者通过掌握实务，以便争取挽回部分权益。如果说，上述第一个特点，基本上是当时朝廷的国策及袁世凯的旨意，唐绍仪只是认真贯彻及稍有发挥而已。那么，第二个特点则主要是唐绍仪依据当时的客观环境而极力推行的一种救国方略。因此，可以预料，这种同国外既得利益集团相对抗的作法，依当时的国势和唐绍仪有限的地位、权力，其收效当然是微乎其微。

1907年唐绍仪在奉天巡抚任内拟定的，修建一条由新民屯经法库门、洮南到齐齐哈尔的大铁路的计划，集中体现了他上述的爱国思想和救国方略。

建造一条同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以抵制日本势力在东三省扩张的构想，虽然在唐绍仪莅任奉抚以前就已提出，但一直只是“纸上谈兵”。唐绍仪则付之实施，并千方百计促其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毫无疑问，这项旨在挽回东三省权益的计划的推行，必然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但唐绍仪仍然“一意孤行”。他一方面运用圆滑的外交手段同日本周旋，以分段修建、暂不宣布，延长关外铁路是为便利清国交通、与南满路毫不相干，

①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篇》第3080--3083页。

②同上书，第3661--3687页。

……等等办法和托辞来对付日本的“抗议”。另方面则立即着手借款筑路，先是拟借美款，无法实现时改借英款。当英国受日本胁迫反而倒向日本一边以后，唐绍仪又转而又向美国寻求援助，甚至不惜与美国合作引进美国资本开发东三省的资源。为了表示对抗日本的决心，唐绍仪联同东三省其他督抚声称：如果这一计划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宁愿集体辞职^①。稍后，唐绍仪在朝廷的安排下，专门为谋求实现这一对抗日本的计划而出使美国。后来，由于日本的从中破坏，并赶在唐绍仪之前建立了日美协定，才使这一联美制日计划陷于失败。

在京汉铁路的整顿以及逐步收回海关主权这两件事，也同样反映了唐绍仪的上述救国方略的构想。

当时已经全线完工的京汉铁路，赎回全路无疑是唐绍仪的奋斗目标，但这并不是短期内所能够实现的。于是，他通过对全路的整顿，以便逐步收回主权。由于该路不少员工过去只知敷衍洋人，以致路权旁落。唐绍仪撤换了一批高级的管理人员，又着重提高广大员工的认识 and 责任心，排除洋员对路权的操纵以及长期以来对该路管理方面造成的不良影响，使华员逐步掌握该路的管理大权^②。

作为节制全国海关的税务会办大臣，唐绍仪对赫德控制海关大权、以致关务和人事均不能自主的状况十分不满。他一方面采用各种可能的办法，限制赫德权力的继续扩张，并以大臣的地位，镇慑赫德那种过份嚣张的声势。另方面则采

①《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

②《顺天时报》，1906年8月1日，26日，12月4日。

取切实可行的步骤，以期实现收回海关主权这个目的。在这些措施中，培养海关人才引起唐绍仪的特别注意。由于海关员工，尤其是一些重要部门的员工，历来均由洋人充当，即使收回海关主权，一时也无法由华人掌管海关事务。因此，唐绍仪提出设立专门学堂培养税务人才的主张^①，在唐绍仪的建议和推动下，税务学堂于1908年正式成立，并取得巨大成绩。民国以后几乎所有海关的华员，均出自该校，收回海关后，担负领导责任的就是这一批人员。

仅据上述，可见唐绍仪在为封建王朝服务的年代中，已为维护国家民族权益作了不小的贡献。

二、顺应民主潮流的开国功臣

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至1912年6月16日辞去国务总理这半年多的日子，是唐绍仪毕生经历中最为辉煌的时期。这段期间，无论从思想上或政治上来说，唐绍仪都是处于巅峰状态。

由封建皇朝的一品大员，转变为民国的建国功臣，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可以看作是一次罕见的飞跃。但是，只需略加考察，便会发现，唐绍仪的这一转变，决非偶然。

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之一，是改变人们的思想，各个阶

①《大公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叶元章：《抗战前的海关往事琐忆》，第11页，台北1987年版。此处转引自赵淑敏：《“税专”与中国海关的人事制度》（1988年在香港召开的中国海关研究首次国际研讨会论文）。

层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主共和思想的冲击。加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清皇朝的瓦解指日可待。汹涌澎湃的民主潮流，既造就了一批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的有识之士，也改造了许多长期受封建传统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当时的这种环境，给唐绍仪的转变提供了绝好的时机。唐绍仪少年留美，接受了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正如他对伍廷芳所说：“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①归国从政以后，又培植了深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并在政治实践中受到了锻炼。1909年的辞官，实在是他对满洲贵族操纵朝政的行径不满的表现，从而萌发了对朝廷进行彻底改革的设想。武昌起义及革命势力的迅速发展，使他认识到取消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已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于是，走上了民主共和的大道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唐绍仪顺应潮流，在南北和谈中促成了中华民国的诞生。所以，一些论者把唐绍仪同孙中山、黎元洪，称为民国肇始三大功臣。^②这无疑是对唐绍仪在南北和谈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过高的估价。但是，如果依据当时的实际状况作出客观评价，称之为中华民国开国功臣之一，唐绍仪应该是受之无愧。

说唐绍仪是开国功臣，需要包括他在南北和谈、出任总理、辞去总理三个方面为民国的建立和巩固所作出的贡献。

1911年的南北和谈，唐绍仪是作为袁世凯总理大臣的全权代表，同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之间进行的。双方的直

^①《辛亥革命》（八），第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英人濮兰德所说，此处转引自李恩涵前引文，“集刊”第54页。

接会谈虽然只历时10多天，开过5次会议，即已确立了双方停战，召开国民会议确定国体，优待退位后的清室等几件关键事项，实际上已为南北统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唐绍仪和伍廷芳之间面对面的会谈，已解决了建立民国所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以后袁世凯和伍廷芳之间的会谈，只是为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出任总统铺平道路。

辛亥南北和谈之所以如此顺利，唐绍仪对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所抱的积极态度乃是决定作用的因素。早在和谈伊始，唐绍仪“已剪辫、服常服”^①，对通过和谈实现民主共和充满信心^②，“敢决其必成”；对于南方所行的主义，“心以为然”，“有希望”^③。因而会谈开始后，从会议记录可以看到，唐绍仪对伍廷芳的各项建议，几乎都采取接受的态度。尤其是关于“共和立宪”的讨论，唐绍仪不仅“无反对之意向”，并表示“今欲和平解决，非共和不可成，实有成

①《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2月18日。

②《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2月19日载：“唐挾议和条件，闻有五：一、改大清为中华民国；二、黄帝纪元与清年号并用；三、改总理大臣为大宰相；四、地方行政长官由地方公举，由大宰相奏任；五、……。袁授意唐，除民主二字，无论何项，均可退步，闻唐初不赞成袁之君主立宪说，已辞职，袁坚挽之，唐遂向袁申说共说之利，闻唐行时，袁颇赞成共和。”同年12月16日《民立报》所载议和条款为22条，但未详列，同上述相较，多了设议院、选总统等。

③《辛亥革命》（八），第79页。

心”①。

当然，应该看到，唐绍仪支持共和，是以举袁世凯为总统作为条件②。但是，“拥袁共和”的方针，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及南北实力对比出发，恐亦不失为一种切合实际的主张。因此，它得到立宪党人和包括黄兴在内的多数革命党人的赞同，我们无须因此而苛求于出自袁世凯门下的唐绍仪。况且，在和谈进程中，唐绍仪又竭力说服袁世凯和北洋将领，企希他们能够接受和谈达成的协议，以便实现共和。唐绍仪向袁世凯汇报第一、二次会议情况的电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唐绍仪说：“……查民军宗旨，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若我不认共和，即不允许再行开议。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近因新制飞船二艘，又值孙文来沪，挈带巨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官兵数十员，声势愈大。……再四思维，维有吁请即日明降谕旨，命总理大臣颁布阁令，召集临时国会，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议，征集意见，以定指归。……”③此外，他又分别致电清军前线统帅、湖广总督段祺瑞和企图带兵反攻南京的张勋，劝他们赞成共和，迫清帝退位④。姑勿论唐绍仪的劝说能否产生效果，从后来因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态度不同而与袁世凯产生严重的分歧，从而导致唐绍仪被撤掉和谈全权代表，以及在临

①《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2月21日。

②《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第123页，1946年版；《张謇传记》第181页，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③《辛亥革命》（八），第222—223页。

④《民立报》，1912年1月20日，2月5日。

时约法、迁都南京、袁世凯南下就职等问题上唐绍仪均支持南方的主张来看，在唐绍仪的心目中，“共和”较之“拥袁”似乎更重要。据当时的报纸报导，亦可证明这一点。

《香港华字日报》载：“闻唐决主共和，如袁不允，则唐与各员不回京。”^①唐绍仪在南北和谈中的功绩，完全应该加以肯定。

出任国务总理，并力图按照共和政体的要求去实施总理的职责，这是中华民国建立后巩固和建设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绍仪就职之初，在向参议院阐述政见时，即展示他的远大理想。他据自己对中国积弱的根源的理解，着重提出要振兴外交实业。他说：“在满清时代与各国所订条约，名为和好，实则从未开诚公布，以致事事皆落人后，皆中国受亏”，所以必须改变对外交涉中的被动状况。又说：“从前社会趋势，专研究文字，而不研究实业，致以地大物博的中国，几变为世界最穷之国家，以致非借外债则不能办兴利之事”，“新政府成立后，即分设农林、工商二部，其宗旨即在振兴实业”^②。对于政府各部门的用人制度，尤其是负责加员的任用，唐绍仪提出：“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苟不至新人物无可搜求，或非旧人不能维持现状之事，决不可延用旧人。”^③唐绍仪的这些主张，充分表现了一个首任总理对建设民国政府的抱负。

①《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2月26日。

②《民立报》，1912年4月2日。

③《香港华字日报》，1912年6月25日。

唐绍仪在总理任内，还力图摆脱袁世凯以总统身份直接插手政务的干扰，以求完全行使内阁总理应有的职责。从唐绍仪组阁开始，袁世凯即以太上皇的姿态干预内阁事务，所有人事安排、财政收支等等，他都亲自控制办理，企图置唐绍仪于傀儡的地位。在袁世凯的高压之下，唐绍仪在许多方面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是，只要唐绍仪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也时常拒绝袁世凯的意旨而独立行事。例如向四国银行团的借款，尽管袁世凯已表示同意，但因银行团提出了需垄断中国对外借款，“监督财政”等非常苛刻的条件，唐绍仪则严词拒绝，并声明：“中国此后借款，皆自有选择之权，无受四国限制之理。”^①又如对比国借款的使用，唐绍仪完全自作自为，其中甚至有相当一部份钱用作接济南方的军费开支和购买新式武器，导致激起袁世凯和北洋派军人的愤怒，唐绍仪亦在所不顾。袁世凯为了笼络张勋，特拨餉银30万元，唐绍仪拒绝签署，只允发给3万元，……等等。唐绍仪的这些作法，无疑是开罪了袁世凯，破坏了他俩之间近30年的友谊，加剧了他同袁世凯和北洋军人之间的矛盾，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抹上阴影。但是，为了维护共和政体以及国务总理的尊严，他却能断然处置，不能不说唐绍仪作为民国首任总理，在民国政府的建设中作出了贡献。

唐绍仪被迫辞去总理职务的因素固然很多，其最基本的原因则是同袁世凯的矛盾已尖锐到无法调和的程度。因此，直接引起辞职的导火线乃是王芝祥的督直问题，唐绍仪拒绝在袁世凯独自委任王芝祥赴南京接收军队的命令上副署。

^①《民立报》，1912年3月26日。